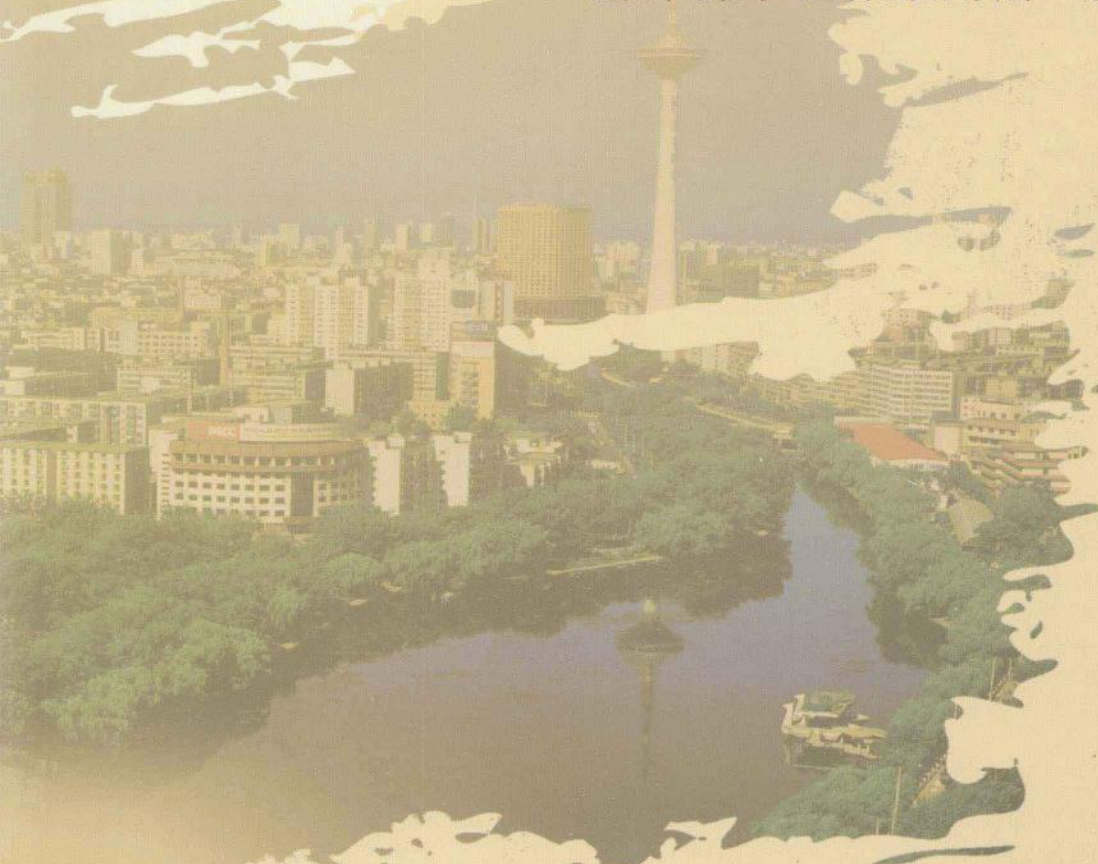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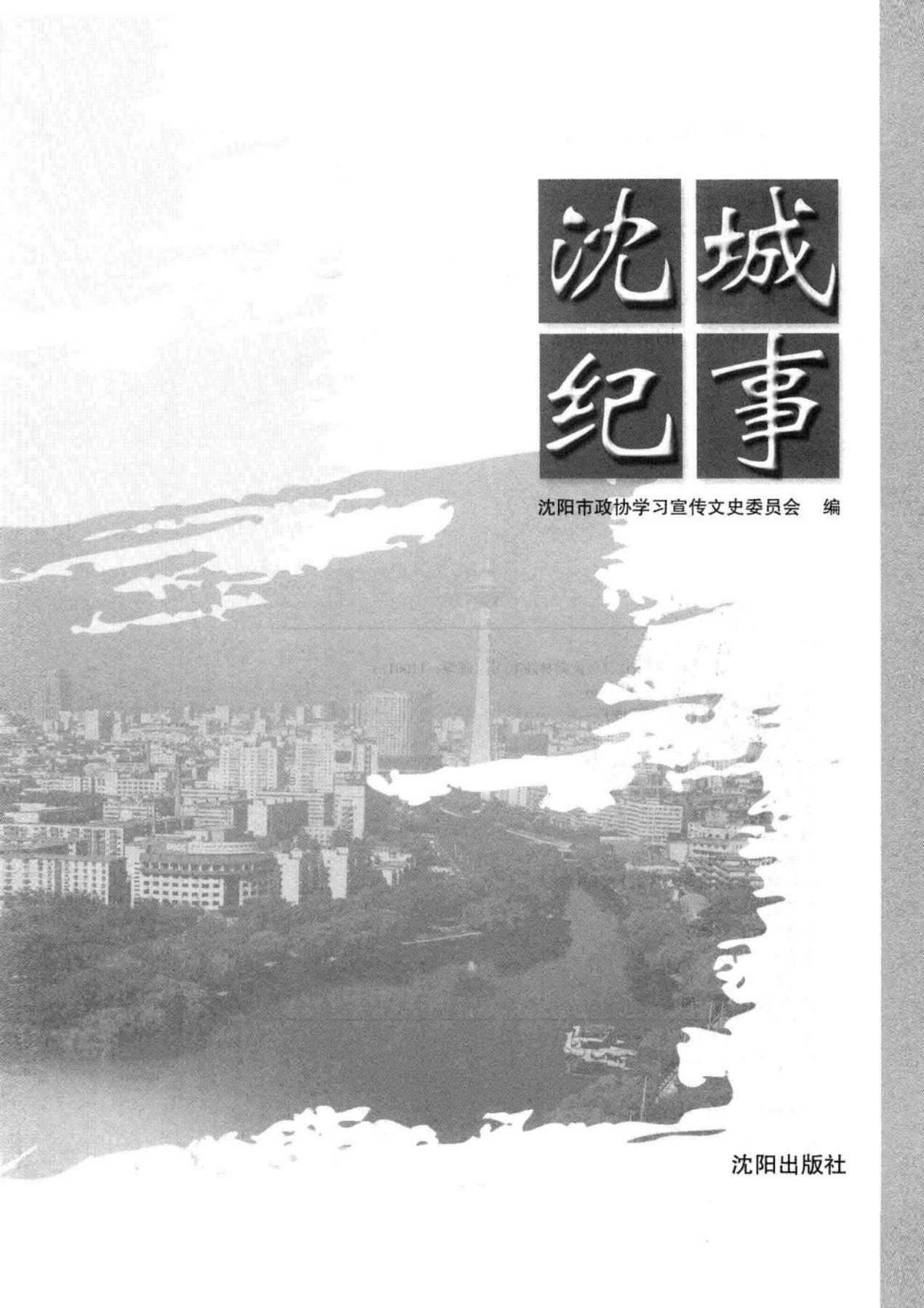


沈城纪事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 编



沈阳出版社



沈城 纪事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 编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城纪事 /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441-4483-4

I. ①沈… II. ①沈… III. ①沈阳市—地方史—史料 IV. ①K29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1184号

出版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

印刷者: 沈阳市华夏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23.5

字 数: 31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出版时间: 2011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姚德军

封面设计: 刘冰宇

版式设计: 姿 兰

责任校对: 伊 凡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483-4

定 价: 28.00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目 录 沈城纪事

contents

走向世界遗产之路	佟 悦	001
见证卧龙湖生态意识觉醒的历程	付毅慧	016
将机遇和奇迹连在一起	王乃义	040
艰苦岁月见真情	李 天	078
在平凡的工作中学习和思考	曹楚南	085
在改革开放时代中成长的台湾同胞	孙桂芬	089
党的对台政策伴我一路成长	赵贵玲	097
我所经历的沈阳旅游业	汪胜平	103
我的抗震救灾日记	张麓曾	107
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	韩玉华	158
帮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	姜跃华	162
沈阳机场候机楼的变迁	丛文光	168
正在崛起的沈阳满融经济区	李基浩	171
我所见证的“科技进山”	曾宪怀口述 任兆岐整理	176
我所知道的纪念币设计师	朱 明	183
说说咱们的造币厂	王玉梅	186
从“大舞台大麻花”到“刘老根大舞台”	佟 悦	189

高花彰驿古城的故事	刘 宾	199
我家住在虹桥路	孙 霞	206
蓝天重回铁西	王石文	208
说房子	姜桐福	210
房屋的变迁	叶秋荣口述 田 松整理	213
改革开放圆了老百姓的住房梦	蒋玉臣	218
浑南新区纪事	王德忠	224
“炕神仙”失业记	王石文	228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刘义东	231
我和李老结缘教育	哈凤霞	234
祖国——我永远的依靠	殷 军	237
家乡才是做事儿的地方	贺 燕	241
我的求学之路	刘 伶	249
祖国——我爱你！	李帼昌	254
以感恩的心报效祖国	胡明健	256
我眼里沈阳的变迁	焦润明	259
青春永恒的三十年	孙 雷	262
我的人生转折	杨洪娟	268
我的音乐变奏“三部曲”	周 皓	272
我与收藏的故事	王 健	276
转型路上铿锵行	单日锐	285
我与中兴三十年	许东志	289
申扬二十年回顾	李宗胜	296
“舒丽雅”创业的故事	张俊义	301
民营医院异军突起	李金萍	311
兴运集团的抉择	蔡俊彦	316
小村新貌	张秀娟	321
发展树莓种植 农民发家致富	马德宽口述 王铁铮整理	324
改革开放让农村大变样	胡玉财口述 王铁铮整理	326
便民服务 群众叫好	姜润龙	329

那年我在沈阳站冻一宿	刘 斌	332
改革开放成就了我的愿	哈凤霞	335
我眼中铁西区社会文化改革变迁	樊红兵	338
“毕马威”在沈阳	苏永海	346
我写蒋经国的“大舅哥”章浩若和中国电影鼻祖任庆泰 ...	罗 雷	350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赵殿清	355
后 记		369

走向世界遗产之路

佟 悦

2004年7月1日，中国苏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次会议与会各国代表表决，正式通过清沈阳故宫、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以下简称“一宫三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和本次申遗工作的参加者，有幸亲身经历了“一宫三陵”，特别是沈阳故宫从申报到入选世界遗产的全过程，见证了这处历史名胜获此殊荣的不平凡经历。

一、保护也需拨乱反正

沈阳故宫创建于1625年，是清王朝入关前的皇宫和入主中原后的陪都宫殿，也是国内现存的两座古代宫殿建筑群之一。作为中国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历史名胜，沈阳故宫虽然早在1961年就跻身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但其古建筑群名副其实地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和管理，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循序渐进完成的。

1985年我被调入沈阳故宫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入馆之初，多年来受“左”的影响形成的对古代文物的偏见尚存。印象较深的是，当时宣传介绍故宫的文字材料中，十有八九要牵强附会地运用“阶级观点”。譬如在叙述故宫如何美好壮观的同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算一算“剥削账”，诸如营造皇宫的耗费可满足多少农

民若干年衣食之需等。“文革”时起还曾经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封建皇帝的宫殿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庄园”，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理论让人们感觉，似乎保护故宫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憎恨它。

事实上，很多年来在文物保护方面，“左”的思想并非只是一些危言耸听的空洞口号，也包括“突出政治”对古代文物造成的诸多损害。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2005年，维修故宫戏台时，工程技术人员惊异地发现，戏台两廊的柱子，并非按传统做法立在做好地基的柱顶石上，而是接在后加的一截木柱上。住建部的同志请我帮忙查一下清代档案中是否有相关记载，结果是没有。经仔细查阅解放后的修缮记录和请老同志回忆，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1968年至1969年间，相关单位要在戏台搞当时闻名全国的阶级教育展览——泥塑《收租院》，但原戏台两廊的高度和宽度都不够，于是革委会“破除迷信”，大胆决定，采用这种破坏古建筑保护的做法，把空间强行加高，同时把前廊柱向外移，重新用现代材料盖顶。虽然顺利完成了“政治任务”，并在展览开幕后把故宫博物馆改名为“沈阳故宫阶级教育馆”，但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戏台建筑原貌，还因没有按传统工艺做地基和防水而贻害多年。我清楚地记得，2005年维修复原之前的20多年，每逢夏秋季节连降暴雨，戏台两廊外的水就向内倒灌，为了保证建筑和文物安全，单位要组织人力，利用相关设备集中在这里昼夜排水，戏台成了那些年里故宫内的“抗洪抢险第一线”。

我到故宫工作最初的几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于1982年正式颁布，古建筑保护中的“修旧如旧”原则日渐深入人心。这虽然比以前有了不小的进步，但以今天的标准看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初级的层面，而且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修旧如旧”难以真正落实。比如沈阳故宫院内的地面，本是用青砖或石块铺砌的，但后来维修时，为节省开支和减少维护的麻烦，有时采用水泥砖代替。众所周知，水泥这种材料在清代营建和修

缮故宫时是不曾使用的。可是直到申遗前不久，某些具体负责人员还是以为地面并非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虽不能完全“如旧”，却是“利大于弊”，仍在留恋水泥砖。另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是，以前故宫东路大政殿前，10座王亭中有7座门前各用铁栏杆围出数十平方米草地，据老同志讲，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为接待某外国元首，因担心砖石地面存留尘土而临时“改造”的，但外宾因故未来故宫，而这七块“草池子”却直到90年代中期才被清除。以致于人们看那20多年间留下的故宫东路照片，虽可见鲜花绿草增添的几分“秀色”，但这七块“稻田地”般的点缀，使本来宽阔深远的东路殿庭，完全失去了昔日皇宫广场应有的庄严肃穆气氛，成为“突出政治”，忽视保护的年代中留下的标志性记忆。而改革开放以来对故宫的保护，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

二、“旅游热”中的“回归”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旅游开发热”、“旧城区改造热”方兴未艾之际，也是许多位于旧城区的古建筑群保护工作面临严峻考验的时期。出人意料的是，一股股“热浪”过后，沈阳故宫不仅没有受到破坏，反而在保护工作方面有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

当时沈阳市老城区发展旅游业的重点之一，是建设从大西门至大东门之间的“清代一条街”，而故宫正是这条街的中心和精华所在，所以受到特殊重视。曾听当时担任院长的铁玉钦先生说过，在那期间先后主持沈阳市、辽宁省工作的李长春同志，多次亲自过问故宫恢复原貌的事，并帮助解决遇到的难题。而我们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的是，短短几年中，沈阳故宫的保护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1985年夏天我去故宫报到时，正逢市政府决定把西路南端的

轿马场（此前被沈河区少年宫等单位占用）归还故宫，故宫的同志们正忙着恢复原貌，准备接待观众。这个区域原本是清代沈阳故宫的组成部分，占地5000多平方米，民国初年即被外界占用，解放后又相继用作社会存车处、儿童游乐场等。其脱离故宫七十多年后，在改革开放，积极促进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回归”，成为故宫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轿马场的回归只是一个开端，随后的几年中，有益于故宫保护的“意外惊喜”接踵而来。

年龄稍大的沈阳市民都记得，“文革”时期（约70年代初），为了新开通的10路、13路无轨电车（即后来的237路公交车线路）能在大东门到大西门之间直接穿行，经当时的“市革委会”决定，把在故宫门前立了300多年的标志性建筑——文德坊和武功坊两座牌楼（建于清太宗崇德二年），全部拆除并移到北陵公园内，此事被人戏称为“帝王将相给工农兵让路”。1986年，这一严重破坏沈阳故宫建筑群风貌和安全的行为终于得到纠正，经市委、市政府批准，两座在北陵松树林中冷落多年的牌楼，被按原样重新油饰安回到了故宫原址，而十几年来从故宫门前穿行而过的无轨电车则改道从南顺城街绕行。记得牌楼刚刚归安后那几天我上下班时，常遇到路过的沈阳百姓边看边感慨地说：这才叫故宫呢！

一年多后，市政府又作出决定，将民国以来一直被外单位占用的清代沈阳故宫南朝房区（当时为电话局家属宿舍等占用）花巨资收回，归还故宫并按清代面貌重新修复，再现当年故宫的完整格局。两项重要举措，使作为故宫“门面”的跨街牌坊重回原地，近万平方米的轿马场和南朝房区域，数十年后与古建筑群主体“团聚”，沈阳故宫基本上恢复了清代建筑群的完整格局。

那个时期，虽然谈到更多的是迅速发展的旅游事业，但无论是省、市政府，还是负责具体管理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都把对这座古建筑群的保护和复原作为发展沈阳市旅游业的重点。在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故宫内部原来用作办公室、宿舍、库房等的文溯阁、太庙、继思斋、銮驾库、后苑等古建筑区域也在1985年至1988年间陆续整修复原，接待游客。至1988年，故宫开放面积比80年代初期扩大近一倍。与此相应的是，故宫在旅游方面的效益也大幅增长，这一年接待观众的人数达到200多万人，创下最高纪录。

三、保护的新步伐

回顾正式申遗前近20年的历史，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前10年中，沈阳故宫的博物馆事业和旅游事业是在改革的大潮中突飞猛进，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保护文化遗产观念的不断深化，古建筑群的全面保护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为沈阳故宫日后能顺利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的基础。

我感受颇深的一个变化是故宫周边环境的改观。此前，故宫路北参观区红墙外西、北、东三面，基本被近在咫尺的旧式民房和商业建筑所包围。由此带来两个隐患：一是某些不法之徒很容易借助民房趁夜越墙进入故宫，危及馆藏文物安全；更令人担忧的是，周围的这些民用和商用旧房，大多是靠烧煤或天然气做饭取暖，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火灾殃及故宫。同时，其用火产生的烟尘等有害气体，也对古建筑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记得原位于西墙外南侧的香雪饭店二层小楼几乎紧贴故宫大墙，每天从故宫院内就可以看到饭店后厨中的炊烟、闻到炒菜的油烟味。我记忆十分深刻的是，那些年每逢春节前后晚上值班时，都要顺着大墙内侧仔细检查是否有未燃尽的鞭炮。除夕晚上尤为紧张，从院长到普通值班人员，自墙外开始燃放鞭炮起，就来到院内的重点部位在冰天雪地中“严防死守”，直到下半夜鞭炮声平息，才能进屋休息取暖。负责消防的保卫人员和故宫东侧的消防队更是严

阵以待，随时准备采取措施扑救火灾。

90年代初，上述问题开始得到全面解决。市政府拨出大量资金，陆续将故宫西墙外的民房和商家动迁，基本消除了来自这方面的火灾和盗窃隐患。此后几年，随着东亚商业广场（后改为“兴隆大家庭”）商厦和东侧别墅楼的兴建，故宫北侧和东侧距大墙较近的旧民房也陆续被拆除。而且大墙与新建建筑之间，留出了基本符合规定宽度的消防通道和隔离带。2001年前后，借故宫南院南墙外沈河区办事大厅及其东侧绿地的建设之机，彻底解决了南侧旧民房对故宫安全造成的安全隐患。十年间，结合对旧城区的改造和新建项目的审批，清代以来就一直困扰故宫安全的周边民房商铺，完全被改造后的新建筑和绿地代替，故宫古建筑群的安全环境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几年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这些前期工作，为申遗的成功增加了相当重要的筹码。

21世纪初，“世界遗产”的话题在我国已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谈论到。虽然对于具体条件及如何申报等细节问题，历史学界和文物界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但“世界遗产”毕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记得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在沈阳召开过一次故宫参与主办的清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清史和文物界学者们在会议期间参观故宫后，联名签署了一份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书，要求将沈阳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觉得有这么多名学者建议，沈阳故宫成为世界遗产肯定大有希望，却不知这种做法并非申遗的正规途径，结果当然是等了很长时间仍杳无音信。但这件事说明，当时沈阳故宫的重要价值和保护成果，确实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进入21世纪后，因为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清东陵、西陵等与沈阳故宫性质地位相近的文物单位都已相继列入世界遗产，而且经过多年努力，沈阳故宫的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客观上已经为“申遗”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于是，随着“世界遗产”品牌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省、市政

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保护文物工作关注程度的不断增强，沈阳故宫申报世界遗产也顺理成章地开始纳入政府工作的日程。

四、踏上申遗之路

沈阳故宫“申遗”的正式启动，应是在2002年初。我当时正被借调到沈阳市博物馆筹备处工作，办公地址设在北塔东院的“沈阳市文物古迹博览中心”。三月下旬的一天，原市文化局文物处通知我和另外几个同志，到省文化厅（在张氏帅府西院红楼内）的一个会议室开会。会议内容是了解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程序和申报文本的编写方法。担任主讲的是一位英国人，我们称之为“大卫先生”，据介绍，他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古建筑保护的专家，因为参加当时世界银行和欧盟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一个项目来到辽宁，应邀为我们介绍关于申报世界遗产的规定。大卫先生用英语讲，由省建设厅的一位领导（海归博士）作翻译讲解，他讲得很详细，用了将近一下午时间。几天后，由于省、市政府已决定正式启动“一宫三陵”申遗工作，我们便开始着手准备撰写申遗文本（当时称为申遗报告）。所作文本共两份，沈阳故宫的一份由我执笔，另一份是盛京三陵中的清福陵和清昭陵，由陆海英（当时由故宫陈列部借调，后任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执笔，两份报告中涉及政府行政和政策法规的部分，由李声能（当时为市文化局文物处工作人员，后任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执笔，此外还有一些同志负责文本中所用的照片、绘图和拍摄录像等工作，全部工作由当时的市文化局副局长张英负责。不久又成立了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遗产领导小组，陈政高市长（现任辽宁省省长）任组长，我们则是下设办公室（简称申报办）的工作人员。同时，抚顺市另有一个班子，负责起草新宾永陵的申报材料。当时要求在八月份完成初稿，交国家文物局审核。

在正式撰写报告之前，曾有一个小的变化。按照辽宁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初衷，“一宫三陵”作为独立项目申报，但国家文物局经过全盘考虑，认为“一宫三陵”分别作为已成为世界遗产的北京故宫、明清帝王陵寝的扩展项目申报更为有利，所以我们的报告是按照扩展项目的要求来写的。由于我们几个人从未接触过与申遗相关的具体工作，只能边干边学，一方面从互联网上下载有关世界遗产的国际公约和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外出学习取经，参考已经申遗成功单位的相关经验。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附属文件的规定，某个项目要入选世界遗产，首先必须由其所在国以政府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申遗报告，其中的核心就是我们要写的这个文本。只有这个报告被接受，才可能继续以后的程序，否则就意味着申遗中止，而且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再获机会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国各地希望申报世界遗产的文物单位有数百个，但按照规定每年只能有一个新增项目和一两个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一宫三陵”能够获准申报，是辽宁省和沈阳市经过多年努力才争取到的，说它是百年难遇的机会毫不夸张！

面对着国家主管部门的信任，省、市领导和人民群众对申遗成功的期盼，作为执笔起草申遗报告者，我们所承担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接受任务时，感觉申遗若不成功，无论什么原因我们都难辞其咎。而当时最头痛的事，是对所要阐述的关键部分不得要领。这个报告是按照规定格式写的，正文部分只有两三万字。我当时在沈阳故宫做研究工作已近20年，所写介绍、研究故宫的文章和论著，从几十字到十几万字的不下百篇，对这里的历史和建筑可谓了如指掌。但申遗文本要求的内容与以往写过的都不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要结合建筑和历史说明这处古建筑群在哪些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或者翻译成“特殊的普遍价值”、“杰出的普遍价值”），也就是说，要按世界文化遗产的6项标准“对号入座”。当时我们手中依据的，只是一些根据英

文翻译过来的干巴巴的条文，不仅没有详细解释，而且由于翻译者用词习惯的原因，一些关键语句的含义令人费解，诸如“特殊的普遍价值”之类。但是，最后提交给联合国的是英文文本，我们的汉文必须表述明晰，否则直接影响英文翻译的质量和申报的结果。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基本上属于政府文件的性质，既不需旁征博引，也不用文采华丽，必须平铺直叙、朴实简捷，言之有物，字字落实，一点都不能“忽悠”。

面对这种情况，只能尽力而为，反复尝试。对照建筑实物，我们一遍遍地写，一次次地请教专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初稿。交到国家文物局后，又反复修改，有时一个星期要跑两三次北京，又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可以翻译成英文了。接着又是准备录像和照片类的申报材料，到这一年的年底，全部材料总算准备齐全，可以上报了。

2003年年初，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前往巴黎，正式将“一宫三陵”的申报文件提交给设在那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不久传来消息，文本已被接受，这就意味着世界遗产委员会已经同意我们正式申报。按理说这应该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事，可我们负责申遗工作的几个人却一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没有，道理很简单，我们的目标并非“申请”而是“成功”，一旦文本被正式接受，就犹如战场上吹响了冲锋号角，没有退路，只能全力向前！可是，后面的路远比写申遗报告要难走得多。

五、开弓没有回头箭

依据关于确定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正式受理某个项目的申遗文件请求后，要委托专业的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英文缩写ICMOS）派遣专家，按照申报文件所提供的情况，亲赴当地考察这个项目的价值和保护情况，写出考察报告，并提出是否可以列入世界遗产的意

见，再将这个报告提交随后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表决。

根据上述规定，“一宫两陵”的申遗文件被接受后，能否顺利通过联合国所派专家的考察，是决定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而这项考察的日期，就确定在2003年9月，距离正式接受申遗文件只有半年的时间！

从当时“一宫两陵”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其古建筑保护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对照世界遗产的要求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这几处建筑群内部，按计划短期内所要进行的维护修缮工程，必须在专家考察之前完成；多年积累的有关古建筑保护的大量文献和档案资料，要对照申遗文本的内容重新加以分类整理。而各项接待考察准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是这几处建筑群周边环境的整治。

应该承认，许多年来国内许多城市的文物保护工作，比较重视对古建筑本体的保护，但对其周边环境的保护却有所忽视，特别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旧城区改造，致使很多古建筑群的周边环境受到破坏。以沈阳故宫为例，如前所述，九十年代以来市政府已经投入大量财力对其周围环境进行整治，且收效显著，但这些改造往往更多地侧重于解决对故宫威胁最大的安全问题，而按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不仅历史建筑本体要保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其周边的环境也要尽可能多地保留与建筑群时代相符的历史风貌。简而言之，故宫周围不能有过多体量超高、距离过近的现代建筑。

当时的实际情形如何呢？至2003年春，在故宫重点保护区范围内，至少有西侧的红墙市场、北侧的原东亚商场F区、东侧的几栋别墅楼、南侧的东煤地质局办公楼等近万平方米现代建筑严重影响环境风貌。因此我们不仅要拆除这些建筑，还要将原址整修得与故宫风貌相协调。完成这项工作，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合理的规划。福陵、昭陵周边的情况也大概如此。“一宫两陵”的周边环境能否按期得到整治，成为申遗过

程中面临的严峻考验，很多人对此忧心忡忡。

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解决上述问题虽然困难重重，但并非像原来想象的那样手忙脚乱地仓促上阵。省、市政府在正式决定“申遗”之前，已经听取人民群众的建议，着手治理“一宫两陵”周边的环境，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故宫四面的一些旧建筑外，北陵内外的泰山宾馆、友园饭店、泰国乐园等也都已经或正在解决。一些尚未得到整治的问题，也都在规划和资金方面作了相应安排，只要时机一到就可以全面实施。话虽如此，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些任务绝非易事，不仅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财力、物力资源，还要求有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记得市政府领导在动员时曾经说：我们的申遗工作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克服所有困难，全力争取成功！

各项工程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出乎预料的困难。从这年春天开始，在南方发现的“非典型性肺炎”（当时简称“非典”）在许多省份传播，电视台每天报道各地疫情和防治情况，为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地区间的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都受到限制，这给我们的工程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记得当时在故宫内外施工的几支古建筑工程队有上百号人，来自几个地区，每天都要经过严格检查才能进入现场，而且无论什么工种，都要戴上口罩；从北京等地区运送古建维修材料到沈阳的大货车，不仅沿途连车带货经过多次消毒，而且下高速公路后不许进入市区，需要把货物转到沈阳当地的车上，才能运进工地。尽管如此，各方面按期按质完成任务的目标没有丝毫改变。在那些日子里，“一宫两陵”成了全市万众瞩目的焦点。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全方位报道；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辽宁省、沈阳市的领导几乎每星期都有人到现场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遇到的困难；与之相关的市属各单位、各部门领导也都亲临第一线现场办公；全市人民通过各种方式对申遗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到八月下旬，内部维修和外部环境整治工程全面竣工。除一些因特殊原因